

鄭 州 大 學 古 籍 所 編

中外學者文選學
論著索引

中 華 書 局

中外學者 文選學論著索引

俞紹初 許逸民 主編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外學者文選學論著索引 / 鄭州大學古籍所編. - 北京:
中華書局, 1998

ISBN 7-101-01407-0

I. 中… II. 鄭… III. 古典文學-文學研究-中國-題錄
索引 IV. Z89:1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98) 第 06931 號

責任編輯: 趙又新

中外學者文選學論著索引

俞紹初 許逸民 主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1/32·10¹/, 印張·232千字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000 冊 定價: 17.00 元

ISBN 7-101-01407-0/I·219

《文選學研究集成》序

《文選》之有注，始於隋朝初年的蕭該。“《文選》學”（簡稱“選學”）專門名家，起自初唐的曹憲和李善。當時去蕭統成書之日不足百年，而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個春秋。

“選學”在唐朝與《五經》相亞，盛極一時。及至北宋，猶有“《文選》爛，秀才半”之風。惟南宋以降，學者棄辭章於弗問，“選學”遂告衰微。然而宋元迄明，著述未嘗中輟。延及清朝，“選學”乘勢中興，張之洞《書目答問》列舉有清一代著述家，專設“文選學家”一目，凡十五家，皆有著作傳世。由此可見，“選學”源遠流長，影響至巨，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，自有其生生不息之活力。

“選學”肇始之初，主要是音釋訓詁之學，今存李善之《文選注》，千載不磨，首創“選學”基業。嗣後由江、淮而汴、鄭，“選學”支派繁衍，代有新作。於注釋之外，又有詞章、廣續、讎校、評論諸學。近代以來，黃侃（季剛）力倡“平點學”，即“文選黃氏學”，其弟子駱鴻凱激流揚波，於1936年撰著《文選學》（中華書局版）一書，總結千餘年“選學”歷史，為“選學”建樹起承上啓下的里程碑。以駱書為界，此前或可稱為“傳統選學”時期，大抵步武唐宋，以注疏、評論為主。此後，現代文學意識介入，研究視野不斷拓寬，探討問題愈加精深，於是“選學”研究進入一個嶄新時期。當今學術界號稱“新選學”者，蓋即接續黃侃、駱鴻凱之學，而發揚光大者也。

以“新選學”為說，確有推陳出新、後出轉精之意，而無割斷歷

史、自我作故之心。一則尊重傳統，師承前賢，一則開拓視野，獨發新意，此已成為近十年中國“選學”復甦的顯著特徵。此種形勢恰好和香港、臺灣地區，以及日本、歐美等國際“漢學”相呼應。1963年，日本報刊首次提及“新文選學”一詞，此後研究《文選》編者、《文選》擇錄標準諸問題的文章相繼問世。不過日本學者所謂“新文選學”，雖有新意，似涵蓋未廣，無法概括當前“選學”研究之全局。目前中國學者認為，“新選學”之範疇約略包括八個方面：（1）文選注釋學；（2）文選校勘學；（3）文選評論學；（4）文選索引學；（5）文選版本學；（6）文選文獻學；（7）文選編纂學；（8）文選文藝學（參見許逸民《“新選學”界說》）。此說是否完善，尚需歷史檢驗，可不作定論，但在《文選》研究中用作參考，不無裨益。

為發展“新選學”，中國學者先後於1988年、1992年，兩次在長春舉辦國際研討會。1995年，又在鄭州舉辦第三次國際研討會，海內外學者濟濟一堂，共商振興“選學”大計。1992年在長春會議上，正式成立“中國文選學研究會”，會址選設在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，迄今會員已逾二百人，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亦已成為海內外學者聯繫的紐帶。基於對“選學”研究歷史和現狀的分析，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決心發揮紐帶優勢，將“選學”作為今後主要研究課題。廣泛聽取專家意見後，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擬從基礎工程起步，圍繞《文選書錄》、《文選集校》、《文選彙注》等為主要課題，規劃為一部多卷本《文選學研究集成》叢書。此構想得到鄭州大學校領導大力支持，特聘請著名學者曹道衡、傅璇琮、沈玉成、穆克宏四位先生，作為鄭州大學兼職教授專任叢書學術顧問。又聘請許逸民先生為鄭州大學兼職教授，與古籍研究所所長俞紹初先生共同主持叢書編纂工作。

《文選學研究集成》叢書擬包括以下十二項選題：（1）中外學

者文選學論著索引；(2)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；(3)文選學研究資料彙編；(4)文選學書錄；(5)文選集校；(6)文選彙注；(7)文選唐注考；(8)文選版本學；(9)文選學發展史；(10)文選編纂學；(11)文選今注今譯；(12)文選學詞典。完成全部十二項選題擬分為兩步走，第一步以《文選彙注》為主體，先集中力量做好前六項。其中(1)(2)兩項，乃為了解近代以來研究成果而設，收錄範圍包括海外“漢學”。第(3)項為唐宋元明清評論資料彙編，第(4)項是歷代著述之總目和提要。第(5)項又分為兩部分，一為白文本集校，欲為“選學”研究提供一個文字定本；一為李善注本集校，為全面校理唐各家注奠定基礎。第(6)項所謂“彙注”者，不同於資料之長編，而是博覽約取，擇善而從，既集前賢之大成，又要出以己意，成一家之言。第(7)項以下屬第二步工作，由注釋學、版本學、編纂學推而及於整個“選學”史研究。在以上諸事俱備之後，庶可進行今注和今譯，反映當今時代特色，構架古今橋梁。最後一項是編纂專科大詞典，是為解讀《文選》之數據庫。

《文選學研究集成》叢書體大事繁，非少數人一時所能完成。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作為項目主辦機構，一直主張校內校外協力合作，並歡迎海外學者共襄盛舉。其實現已成書的《中外學者文選學論著索引》、《中外學者文選學論集》，正在編撰的《文選學書錄》等，無不成于校內外、海內外衆多學者之手。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願再次表達尋求合作之願望，期盼《文選學研究集成》叢書成為海內外學者共建共享之學術大廈。

值此《文選學研究集成》叢書陸續問世之際，謹此說明編纂緣起及其體例與計劃如上，以商諸同好，就正于方家。

俞紹初 許逸民

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二日

編輯說明

一、本書是近代以來“文選學”研究論著的總目索引。其收錄範圍既包括單篇論文，也包括專題著述，時限起自1911年1月，迄於1993年6月。

二、本書總體編次，按地域分爲四部分，（1）中國（包括香港、臺灣地區）；（2）日本；（3）韓國；（4）歐美。每一部分之前均有編輯者撰寫的概述，簡要評介該地區“文選學”研究的歷史與現狀。

三、每一地區的論著按單篇論文和專著劃爲兩部分，單篇論文在前，專著在後。單篇論文又分爲總論和分論，總論包括《文選》編纂者及其成書時代研究、選文標準研究、版本流變研究、注疏體例研究等方面的論文，分論包括《文選》所收作家及其作品方面的論文。

四、基於“文選學”的研究範圍，凡研究《文選》篇目的單篇論文一概著錄，而作家研究僅選收生平考訂及關乎作家和作品總論的論文。

五、專題著述，主要指研究《文選》的各類專書，同時包括一些《文選》所收作家的別集注本或選注本。

六、不論單篇論文的總論、分論和專著，悉以刊載、出版日期爲先後順序。只有中國部分的分論，因爲篇目較多，爲便於檢索，再劃分爲先秦、兩漢、魏晉、宋齊梁四段。單篇論文著錄體例，先列篇名、作者，後列報刊名稱、出刊年月日、卷期。如論文發表後又收入專書出版者，則注明書名、編者和出版者。作者爲兩人者，人名全

錄；三人以上者，則僅錄第一人姓名，並於其後加注“等”字。專著著錄體例同此。

七、本書中國大陸部分的資料，由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負責編錄，先後參加工作的有宋恪震、李之亮、毛德富、段書偉、徐正英、王慶梅，其中毛德富又分工撰寫《概述》，王慶梅分工整理全部資料，所做工作最多。中國港臺地區的資料，由臺灣學者游志誠負責編錄，日本、韓國、歐美各部分的資料，則分別由日本學者佐竹保子、韓國學者白承錫、美國學者康達維負責編錄。全書的定稿人爲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俞紹初。

目 錄

中國(包括港臺地區)“文選學”研究

- 一、概述..... 毛德富 游志誠(1)
- 二、論文索引..... (14)
 - 1、總論 (14)
 - 2、分論 (30)
 - 先秦 (30)
 - 兩漢 (99)
 - 魏晉 (122)
 - 宋齊梁 (174)
- 三、專著索引..... (189)

日本“文選學”研究

- 一、概述 [日]佐竹保子(195)
〔附錄〕日本研究《文選》的歷史與
現狀..... [日]牧角悦子(199)
- 二、論文索引..... (223)
 - 1、總論 (223)
 - 2、分論 (233)
- 三、專著索引..... (265)

韓國“文選學”研究

- 一、概述 [韓]白承錫(273)

二、論文索引	(281)
1、總論	(281)
2、分論	(282)
三、專著索引	(284)
歐美“文選學”研究	
一、概述	[美]康達維(285)
二、論文索引	(292)
1、總論	(292)
2、分論	(292)
三、專著索引	(302)
引用報刊簡目	(305)

中國(包括港臺地區)“文選學”研究

一、概述

毛德富 游志誠

自辛亥革命迄今計九十餘年間，我國“文選學”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：一是1949年以前傳統“文選學”的延續和轉型時期；二是1949年以後至1976年“文選學”研究的低谷時期；三是近十餘年來“文選學”研究的復蘇時期。下面試分述之。

張之洞在《輶軒語》中說：“選學有徵實、課虛兩義。考典實、求訓詁、校古書，此爲學計；摹高格、獵奇采，此爲文計。”所謂徵實，即徵史釋事、刊誤正譌；所謂課虛，即含英咀華、奇文賞析。二者在清代均達到鼎盛。傳統選學研究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長期受到冷落，是無可否認的事實，但因有一批像高步瀛、黃侃、駱鴻凱、劉文典等學識淵博的專家的辛勤耕耘，仍然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成績。

這一時期在版本、校勘、注釋方面發表了一大批文章，體現着此期“文選學”研究的實績。如劉盼遂先生的《文選校箋》（《文哲月刊》第一卷第一期、第三期）、《文選篇題考誤》（《國學論叢》第一卷第四號）、祝文白先生的《文選六臣注訂譌》^①等文在《文選》的考訂、校勘、詮釋上用力甚勤，所獲亦甚多。朱少河先生的《李善注文選諸家刊本源流考》（《雅言》卷七），詳述李注版本之源流時，認爲“張伯顏初刻本，雖在延之之後，實爲余璉序刻之所祖”。又疑胡刊所本也是張伯顏初刻本。張壽林先生的《唐寫文選五臣注本殘卷

跋》(《文學年報》第七期)則以新發現的唐鈔本殘卷與通行李注、六臣注本進行按校,考定此唐鈔本不僅仍為三十卷,且於各家注刪改殊少,認為此本雖已非五臣之原貌,然尚可由推知一二。向宗魯先生的《書陸善經事——題文選集注後》(《斯文半月刊》第三卷第二期)勾索陸氏的著述及其注釋《文選》的事略,為研究陸氏其人及陸注《文選》提供了珍貴的線索。繆鉞先生的《文選賦箋》(《中國文化研究匯刊》第七卷)其實是四篇小論文(後來有的擴充為單篇論文發表),如對班固《兩都賦》政治意義的闡發和潘岳《閑居賦》“以偏宕之筆,發憤慨之思”心態的描述,以及認為曹植《洛神賦》乃是寄托任城王冤死之事等,亦不失為一家言。劉文興先生的《北宋本李善注文選校記》(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》第五卷第五號),利用家藏北宋天聖明道本殘卷與胡刊讎校相異者數十條,為李注《文選》的校刊提供了可貴的例證。

此外,駱鴻凱先生的《選學書著錄》(《學術世界》一卷七期)、蔣鏡寰先生的《文選書錄述要》(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》三號)、壽普暄先生的《文選書目》(《女師學院期刊》第二卷第二期)等則從目錄學的角度,為治選學者叩扉問道指點門徑。周貞亮先生的《梁昭明太子年譜》(《文哲季刊》第二卷第一期)和胡宗楙先生的《昭明太子年譜》(《夢選樓文鈔》)為研究蕭統、知人論世的大輅椎輪。何融先生的《〈文選〉編撰時期及編者考略》(《國文月刊》第七十六期)初步確定《文選》編撰“開始於普通中”,“完成於普通末年(即七年)之後”,並率先提出“《文選》一書並非昭明太子一人所編撰”,“此時期中服職東宮之學士,皆可能為《文選》之編輯人”的觀點,進而認為劉孝綽可能“為《文選》之主要編輯人”,劉孝綽與王筠參與編輯的“可能之成分尤高”。半個多世紀後的學者對這些問題的認識,一般都是在何氏論證基礎上所作的發展。壽普暄《胡克家〈文選考

異>叙例>一文^②；對《文選考異》的著作權提出質疑，認為此書“實為彭兆蓀獨力撰著，顧千里或與參討，而胡克家則全為掠美者也”。周祖謨先生的《論文選音殘卷之作者及其方音》（《輔仁學誌》第八卷第一期）則從語言學的角度證明唐本《文選音》殘卷（伯2833）所作音，大致與江都選學諸大師所作音合，因此認為此《文選音》殘卷作者乃是許淹，與王重民先生的假定蕭該為《文選音》殘卷作者說不同，^③但此說欲成定論，則猶待有進一步的例證。

這一時期也發表了不少從新的角度研究“文選學”的論文，其成績雖遠遜於傳統選學的研究，意義却是顯見的。這些論文的作者經受過新文化運動的薰陶，利用現代分析歸納方法，結合《文選》中某一問題進行研究，或長於比較，或善於綜合，視野比較開闊，立論也比較新穎。如關於《文選》的選錄標準問題，雖然最早注意並確認是“沈思”、“翰藻”者為阮元，但到了現代的專家學者的論著以及一些文學史、文學批評史中，在贊同這一觀點的同時，對如何理解“沈思”、“翰藻”的含義及如何評價這種選文標準提出了各自的看法，如郭紹虞、羅根澤、陳中凡、朱自清、張志岳等。其中朱自清先生的《〈文選序〉“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”說》（《國學季刊》第六卷第四號）最有代表性，他在贊同阮說的同時，又指出阮氏的兩點疏忽，並詳細闡明了這兩句話的含義，認為“‘事’‘義’兩字無論連文或對舉，都是義含事中，事以見義”，二者是不可分割的，沈思即是深思，翰藻即是文采。此說得到不少人的贊同，認為替這兩句話找到了確解。並由此引起後來不少學者的關注和討論。

另如陳冠一先生的《蕭選姚纂曾鈔在文學上之分析》（《北平半月刊》第一、二、三期），王錫睿先生的《蕭梁文選及古文辭類纂編例之比觀》（《國學叢刊》第三卷第一期）則運用比較法研究了《文選》

的選文標準、編纂體例和編者的文學思想，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。

此期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幾部“文選學”專著，如黃侃先生的《文選平點》、高步瀛先生的《文選李注義疏》（下引簡稱《義疏》）、駱鴻凱先生的《文選學》、劉文典先生的《讀文選雜記》等，均在某一方面取得很高成就。《文選平點》是黃侃 1922 年（壬戌）在清胡克家刻本上面親加評語和圈點，1961 年由其侄黃焯匯編成書，於 1985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此書雖曰“平點”，却包括校勘、正音、糾誤、訓詁、釋事等多方面的內容，頗見精義。因此，黃氏被後人譽為本世紀選學研究之第一人。

高氏撰《義疏》始於 1929 年，1940 年因病逝而僅成八卷，曾由北平文化學社排印出版。此書旁徵博引，詳盡賅洽。考證則窮本溯源，詳考本末；注釋則標舉衆說，條辨縷析。每一條詮釋考證若從《義疏》中析出單行，都是很有價值的考據論文。《義疏》校勘精審，不僅校明現存李注的各種版本及其與六臣注之異同，而且還利用了清人無法見到的故宮博物院藏古鈔本、敦煌唐寫本殘卷等來校正諸本之誤，從而在校勘上囊括前賢，陵越古人。儘管《義疏》未竟全功，但其總結前人的集大成著作的成就仍為學界所公認。

駱氏是黃侃的入室弟子，平生潛研經、子，博涉文、史，尤精於古文字、聲韻、訓詁和《楚辭》、《文選》之學。駱氏《文選學》在繼承傳統選學的基礎上，第一次全面、系統地對《文選》進行整體研究。此書既有對《文選》的纂集、義例、源流、體式等湛深的研究，又意在為研習《文選》者架設津梁。全書結構嚴密、搜羅廣博、考證詳實，立論矜慎，作為現代唯一的一部從整體上研究“文選學”的專著，其影響甚遠，被學界譽為“新選學的開山之作”。

劉氏《讀文選雜記》是其研習《文選》二十年考訂方面的結晶。

與《淮南子校錄拾遺》合並一書，商務印書館於1938年初版。此書校釋精審、考訂詳密，每下一個結論總是廣徵博引，做到信而有徵。如對《登樓賦》之“匏瓜”是星名的考辨，《蕪城賦》中有關詞語的訓釋訂正，《七啟》“望雲際兮有好仇”對“仇”“逯”之訓考等，都可見出作者學風的謹嚴和學識的淵博。

這一時期在《文選》版本的整理出版及其選學研究專著的出版方面，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。前者如上海中華書局據胡本校刊的《四部備要》本《文選》，商務印書館刊印的《國學基本叢書》本《文選李善注》；另外，羅振玉影印的《唐寫本文選集注殘本》，也是當時《文選》研究中的一件大事。後者又包括整理出版前人的專著和今人的選學成果。如清趙晉《文選敏音》（上海大東書局影印《指海》本），張云璈《選學膠言》（《文淵樓叢書》影印本），朱珔《文選集釋》（上海受古書店影印），許巽行《文選筆記》（《文淵樓叢書》本）等，又如丁福保編《文選類詁》（醫學書局印）以及前述駱氏、劉氏、高氏諸作印行，等等，不同《文選》版本的整理和多種“選學”專著的出版，為選學研究深入展開提供了良好的條件。

總之，這一時期的“文選學”研究儘管處於逆境衰勢，不少專家學者仍能踵武前修，總結更新，雖然已不復躋於顯學，但依然有着平緩的發展。

1949年到1976年近三十年間，《文選》遭受空前的冷落，發表論文僅有五篇。它們是李嘉言的《試談蕭統的文學批評》（《文學評論》1961年第2期），王運熙的《蕭統的文學思想和〈文選〉》（《光明日報》1961年8月27日），郭紹虞的《〈文選〉的選錄標準和它與〈文心雕龍〉的關係》（《光明日報》1961年11月5日），殷孟倫的《如何理解〈文選〉編選的標準》（《文史哲》1961年第1期），程毅中、白化文的《略談李善注〈文選〉的尤刻本》（《文物》1976年第11

期)。前四篇主要集中討論《文選》的選文標準及蕭統的文學思想。總的講，他們都承認“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”是其選文標準，具體怎樣理解其內涵又各有出入，不一一細述。程、白二先生之文根據北宋國子監刻本和宋代有關書目記載，認為尤本並非“從六臣注本摘出”，對傳統的李注摘出說提出不同意見。這一觀點已被日本學者岡村繁先生所接受。

1976年以後，學術界對一切有價值的優秀的文化遺產進行重新認識和評價。被冷落了半個多世紀的“選學”重新受到學術界的關注。

新時期的選學研究並不局限於《文選》本身或傳統的注疏考證，而將《文選》放在中古時期的文化氛圍中加以考察。其中《文選》與《文心雕龍》的比較又最為熱門，發表不少文章。在這個問題上，學術界總的看法是比較一致的，即蕭與劉關係密切，並受劉的影響。蕭比劉的文學觀念明確，但具體的側重點又各有不同。劉躍進先生把蕭統放在梁代中期的文學思潮史上去研究，認為梁代文學思潮的每次變化，都是當權者提倡、哲學思潮影響和士人心態反映的結果。由此推測：《文選》編撰目的有二，“一是借此‘研尋物理’，一是藉以‘顧略清言’，向世人展示歷代文章體裁之美”。“事實上，它是一定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必然產物。梁代中期文學復古思潮的形式，是皇太子蕭統具體貫徹乃父蕭衍文化政策的必然結果”（《文選學論集》第246——261頁）。至於《文選》對唐代文學的影響，雖衆所周知，但過去一直無人專文論述，朱金城、朱易安（《文學評論》1985年第6期）、李暉（《文選學論集》第333——349頁）諸先生的文章開始彌補了這一缺憾。陳復興先生的《〈文選〉京都賦與漢代的空間意識》（《社會科學戰線》1989年第3期）一改過去對賦的否定與責難，選取新的視角，肯定京都大賦所表現出的漢代的

宇宙感和空間意識，所隱藏的那個時代開放、進取與遠征的精神境界。從語言學、訓詁學、修辭學的角度挖掘《文選》中保存下來的中古時期的聲韻、語言文字的資料價值，也是當代選學研究的熱點之一。

此外，倪其心先生的《關於〈文選〉和文選學》（《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》），把《文選》和“文選學”置於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的傳統和發展之中來考察，肯定了整體認識《文選》的歷史文化價值，歷史地辨析了“文選學”的學術源流，指明了今後全面整理《文選》的基礎工程和深入研究《文選》的方向、途徑。許逸民先生《再談“選學”研究的新課題》（《文選學論集》）則更加具體地提出了振興選學的奮鬥目標和研究課題。對於深入選學研究，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

本時期選學研究的特點還表現在研究課題的深化上。如曹道衡、沈玉成先生《有關〈文選〉編纂中的幾個問題的擬測》（《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》）一文，在何融說的基礎上，進一步推定劉孝綽協助蕭統編《文選》應在大通元年至中大通元年期間（527～529），又據《文選》中對天監後期至普通中逝世作家的作品取舍情況，認為可能與劉孝綽的愛憎有一定關係。在沒有更直接更有力的新史料發現之前，“擬測”如作者自謙似有“以意逆史”之嫌，但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，具有一定的說服力。

又如《文選》的選文標準，從阮元首發，到朱自清專文論述，以至於成為學者關注的熱點之一。如前述，歷來學者都沿用成說。沈玉成先生在研究《文選序》後三段的基礎上，認為“沈思”、“翰藻”是對上兩句“綜輯辭采”，“錯比文華”的補充，並非對選錄標準的確定。“換句話說，他在這段文字裏提出的是選錄的前提而非選錄的標準”（《文學遺產》1984年第2期）。關於蕭統的文學思想，沈文